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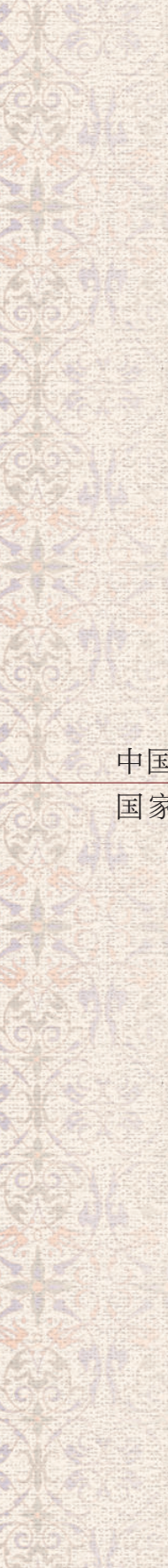
【十卷本】

通古斯鄂温克语研究

多丽梅 朝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通古斯鄂温克语研究

多丽梅 朝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通古斯鄂温克语名词形态论	001
第一节 数形态变化系统	002
第二节 格形态变化系统	009
第三节 人称领属形态变化系统	023
第四节 级形态变化体系	030
第五节 通古斯鄂温克语名词形态变化总论	039
第二章 通古斯鄂温克语动词形态论	044
第一节 态形态变化系统	044
第二节 体形态变化系统	050
第三节 陈述式形态变化系统	061
第四节 祈求式形态变化系统	091
第五节 命令式形态变化系统	097
第六节 假定式形态变化系统	101
第七节 否定式形态变化系统	106
第八节 形动词形态变化系统	118
第九节 副动词形态变化系统	123
第十节 助动词形态变化系统	134

第十一节 通古斯鄂温克语动词形态现象总论	142
结束语	148
附录 1 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及相关特征	168
附录 2 通古斯鄂温克语词汇分类及结构特征	173
附录 3 通古斯鄂温克语句子成分	180
附录 4 通古斯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文化资料	186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2

前 言

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的鄂温克族共有 30875 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市、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市等地。历史上，鄂温克族曾被称作“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索伦”一词出自满语，有“先锋”、“射手”和“请来”之意。明末清初，“索伦”也包括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后来，其他民族逐渐从“索伦”中分离出来，“索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市鄂温克族的称谓。“通古斯”主要是指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锡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这部分鄂温克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历史上也被称为“使马部落”。饲养驯鹿并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人在南迁以前生活在西伯利亚产宝石之地，所以采挖宝石的突厥人称其为“雅库特”，意思是“生活在产宝石之地的人”。后来，俄罗斯人也沿用“雅库特”一词，作为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称呼。1958 年 3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把鄂温克族的三大分支民族名称统一为“鄂温克”。

通古斯鄂温克族作为鄂温克族的三大分支之一，曾被外族人称为“通古斯”、“哈木尼堪”等，历史上其一直自称鄂温克人。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通古斯鄂温克人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他们的首领是根特木耳，“由于不懂觐见皇帝礼节而惹祸，皇上降旨砍头，清兵追捕，根特木耳大难临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领一部分鄂温克人返回原居住地尼布楚”^①，投奔了沙皇。于是沙皇派这部分鄂温克人守卫边防，还封根特木耳为“基那

^① 吴守贵：《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民族出版社，2008。

斯”。他们住在俄国境内额尔古纳河流域，也就是“乌鲁楞古”与“敖嫩宝如金”以及“乌者恩”等地区。其中，“乌鲁楞古”与“乌者恩”两地离额尔古纳河 20 多里，“敖嫩宝如金”离额尔古纳河 200 多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为了躲避战乱，1917 年至 1925 年间，有 70 多户通古斯鄂温克人从苏俄境内迁到我国境内的陈巴尔虎旗特泥河一带。迄今为止，通古斯鄂温克人在这里生活了近一百年，他们主要居住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民族乡，还有一部分在鄂温克旗。这里草原浩瀚、牧场优良，被老舍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莫日格勒河贯穿全境，自然景色早晚变幻，四季各异。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通古斯鄂温克人在此生存和发展畜牧业的有利因素。

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经济主要是畜牧业。他们夏天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冬天住在定居的房子里。他们熟悉各种牲畜的习性和牧草的性质。当牧人选择牧场时，只要闻到草味或尝一下，就能判断牧草的营养价值如何。在高山上脱下帽子，可以测量出风的强度。优秀的牧人都知道几十种草的名称和营养价值，以及适合哪种牲畜的胃口。牧民不论男女，一般从六七岁开始帮助父母看管牛犊，女孩从 10 岁开始跟母亲学挤牛奶。如果女孩子过了 10 岁还不会挤奶，就会受人讥笑。男孩 7 岁开始学骑马，最初和父兄骑一匹马，或者备小鞍骑老实马。男孩学会骑马后就可以参加赛马，再大一些就要学习套马、驯马的技术。在牧区由于执行了“定居与游牧相结合”、“自由放牧”等各项政策，使鄂温克人的畜牧业经济迅速发展，畜牧头数从 1945 年的 1000 多头（只）至 1950 年的 3300 头（只），到 1953 年又增长到 8118 头（只）。如今，通古斯鄂温克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和相邻的其他民族比起来，通古斯鄂温克人普遍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处于“靠天养牧”的自然生存状态，生产方式单一，达不到规模经营，牧民的收入完全依靠活畜销售或畜产品销售。

历史上，在与不同地域和相邻民族接触交往中，通古斯鄂温克人有过不同宗教信仰。如在俄国境内生活时期，当地人曾经向通古斯鄂温克人宣传过东正教，其中就有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小孩出生后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信仰东正教。迁回我国境内之后，信仰东正教的人逐渐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笔者听说在牧区还有人在丧葬的时候请牧师引路的习俗。同

时，在和相邻的布里亚特人接触过程中，通古斯鄂温克人也接受了喇嘛教，现在还有些人经常去喇嘛庙，甚至还在喇嘛庙里自己出资供奉佛像。尽管如此，这些宗教信仰都无法取代萨满教在通古斯鄂温克人心中的地位。萨满教是崇尚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有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通古斯鄂温克人中，每个氏族都以一种鸟作为图腾标志，如天鹅、水鸭等。他们对自己氏族的图腾鸟非常尊敬，当图腾鸟从头上飞过，要向空中洒一些牛奶，表示尊敬。绝对禁止杀害或损害图腾鸟的行为。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苏木里就有好几个萨满，他们有法衣、法帽、神鼓等，在社会上有较高威信。这次去鄂温克苏木做田野调查时，听说一位叫丹巴的老萨满刚刚去世，丹巴是一位非常有法力的萨满，很多人有事就找他，对他的离去，大家都很惋惜。另外在苏木里现在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萨满叫斯仁巴图，笔者有幸偶遇斯仁巴图，无奈仅一面之缘，他匆忙赶路未能采访他。可见，通古斯鄂温克人的萨满教信仰会一直持续下去。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著名通古斯学专家杨虎嫩曾提出“从思想底蕴上讲，所有人类语言在坐标上都是不分伯仲的，但其中的一些语言，在其固有的重要性上，总是比其他的略胜一筹。鄂温克语便是一例，与其毗邻的其他语言相比，它独特的重要性是很难被置之不论的。其原因包罗万象，有语言因素也有超出语言的因素。”^① 通古斯鄂温克语作为鄂温克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蕴藏并积存了丰富的文化现象。比如，在通古斯鄂温克语里大量保存着故事、神话、传说、诗歌、谜语等口头文学，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整理。其次，语言是这个族群千百年来的知识和经验的总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鄂温克人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获取了生产生活的经验，语言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一代又一代传授着经验和教训。更为可贵的是，通古斯鄂温克语里还保留着一些早期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的词汇，例如狩猎词汇、畜牧业词汇等，有其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人们在接触这种美妙的语言时，能体会其中存在的丰富的寒温带文化、动植物文化、畜牧业文化、信仰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科学地论述该语言的语

^① [英] 杨虎嫩：《鄂温克语言的未来》，《满语研究》2002年第二期。

音、词汇、语法关系及规律，同时也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展示或阐释他们以畜牧业生产生活为核心的文化与文明。通过了解通古斯鄂温克人对其生活过的山脉、河流等自然环境的说法及称谓，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其走过的历史轨迹、创造的文化与文明、丰富的思想理念、独到的思维方式等等。

通古斯鄂温克人使用的母语，充分展示着他们千百年来走过的生产生活历程，以及他们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文化与文明。他们行走在草原和山林间，进行着自然的生产生活及其活动，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以此为特殊的思维规则和语言及其表达形式。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生存的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社会基础及其生产生活，就没有丰富多彩思想和思维；如果没有丰富多彩的语言及其表达形式，也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和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内容，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内涵和语言载体。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从某一民族语中，去挖掘和阐释不同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刻的含义，也可以解释不同文化和文明所具有的不同结构类型、不同形式内容、不同历史来源、不同发展走向。特别是，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这样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上用文字记录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极其有限的民族或族群来讲，其母语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客观实在地记录和分析整理他们母语语音系统、词汇结构、语法体系掌握他们独特的思维规则与语言表达形式，从而更为深刻地探讨和阐释他们的历史、文化及其文明。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深刻认识和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分析语言和社会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规律。譬如语音，生存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其语言的语音及语音系统各有特征，词汇内涵也不相一致，语法结构也有所不同。所有这些，毫无疑问和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环境与生存条件，以及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存方式均有其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如上所述，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濒危和消亡，其中积存和蕴藏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现象也将随之消失，进而给人类自身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了避免人类的思维功能、词汇宝藏、语法形式及表现手段等从曾经有过

的极其丰富、绚丽多彩的状态逐渐走向单一、枯涩和乏味，我们有必要在通古斯鄂温克人中加大宣传促使其认识保存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同时随着语言的变迁，我们应更重视在民族聚居区的语言保护和传承。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鄂温克语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俄罗斯，甚至蒙古国都有分布，应该进行更为频繁的交流，以增进鄂温克族同胞之间的来往，从而让这种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我国制定、颁布、施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这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政治基础，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使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近年来，我国还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开展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化现状调查研究工作，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数据库”、“建立少数民族‘双语’环境建设示范区”等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工程，并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绩。然而，对于处于偏远边疆地区、使用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例如通古斯鄂温克语，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挖掘。对这些濒危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我国特殊族群，现在只有 2000 多人。有 100 人左右较好地掌握该语言。同时这种语言又在不同程度地受到蒙语、俄语和汉语的影响。它已经走到了即将消亡的边沿，成为严重濒危语言。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人口现有 1992 人，多数居住在鄂温克苏木。由于与布里亚特蒙古族和巴尔虎蒙古族相邻居住，经济、文化等相互接触，因此在语言方面受蒙语的影响很大。另外一方面又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是 1918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从苏俄迁徙过来，早期又不同程度受到俄语的影响。同时，汉语作为强势语言，在通古斯鄂温克语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汉语借词。根据我们田野调查的资料，在他们不足 2000 人口的特殊族群里，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都能够很流利的使用通古斯鄂温克语，除此以外，也都能自如地使用蒙古语，有些老人还能说较为流利的俄语，甚至个别的老人能说日语。相对而言，老人的汉语沟通能力较弱，这是因为，

在草地上的牧民，他们听的是蒙语广播，看的电视也是蒙语节目，如果不走出去，汉语的使用机会就很少。而在中年人里（40~60岁）情况就不一样，他们基本都能说通古斯鄂温克语，个别的词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但蒙语的运用能力很强，很多人上过蒙语学校。另外，汉语也都能表达清楚，这和他们与外界接触较多有关。他们有些人参加在苏木政府的工作，还有些在外面工作或经营个体，他们在工作或社会活动中都使用蒙语和汉语，回到苏木或者遇到族胞就用通古斯鄂温克语。而年轻人中（20~40岁），多数人还能讲通古斯鄂温克语，也能听懂。但在他们的语言交流中，用一定数量的蒙语代替了他们所不知道的通古斯鄂温克语词汇，并且使用蒙语交流更为普遍，只有在家庭内部交流时才出现通古斯鄂温克语，甚至有的年轻人只能听懂不会说，还有些年轻人认为说蒙语是一种时髦现象，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通古斯鄂温克语的使用人口。在青少年中（10~20岁），通古斯鄂温克语的使用者越来越少，很多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就用蒙语交流，也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水平普遍比较高。而适龄儿童（10岁以下）都到陈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库仁的学校接受教育，那里设有民族幼儿园和民族小学，学校通过蒙语教授学生文化知识，所以上学的孩子都懂蒙语，放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可以听父母说通古斯鄂温克语，但口语用得比较少，这些孩子的汉语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从以上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通古斯鄂温克语在鄂温克族聚居区使用的情况不太乐观，随着年龄的减小，语言的使用人数也呈递减趋势。虽然通古斯鄂温克语的使用情况和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比起来，情况略好，但随着年轻人的较少使用，儿童的蒙语化、汉语化趋势的加深，通古斯鄂温克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由此可见，通古斯鄂温克语在强势语言的冲击之下，使用者变得越来越少，就是在少数人使用的通古斯鄂温克语里，也吸收了数量可观的来自蒙语、汉语以及俄语等其他语言的借词。这种外来语的致命影响，不只是关系到该语言的词汇结构，同时也关系到他们语言的语音系统，及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等方面。所以，对于该语言的全面系统地研究显得十分紧迫，也表现出该项科研工作的极其重要的现实的和长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保护通古斯鄂温克人使用的母语，对于传承该族群独特的畜牧业文化及其文明，弘扬他们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增强该族群的语言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传承性及活力等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国境内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同蒙古国的哈木尼堪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通古斯诸民族，共同构筑了悠久而远古的以畜牧业为核心的独特而古老的文化与文明。通古斯鄂温克人用生命和信仰保护并传承着畜牧业及其文化。通古斯鄂温克人使用的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的莫日格勒方言，在他们的语言中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密不可分的共同点确实有不少，有许多同源词和同源关系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尤其可贵的是，通过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里早期的一些语音、词汇、语法现象。因为，通古斯鄂温克语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早期传统文化的成分。另外，我们在前面也说过，鄂温克语词汇中有关自然现象、山河湖泊、动植物的名词术语，以及有关寒温带山林地区放牧牛马及其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用语最为丰富。通古斯鄂温克语的抢救性研究，对我国牧区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名词术语的研究、错综复杂的生命符号系统的科学阐释和深度探讨、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文化的科学论证、鄂温克族畜牧业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人类记忆的收集整理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伴随通古斯鄂温克语的濒危，其中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我国寒温带地区山林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方面词汇不断消失，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少。为此，对于这一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显得刻不容缓。保护通古斯鄂温克人使用的语言，对于传承该族群独特的以畜牧业为纽带的特殊文明，弘扬其优秀而独特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学术战略意义。

国外学者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卓越成果。其中，做出突出的贡献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著名语言学家杨虎嫩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纪末的20年间，他多次到中国内蒙古鄂温克族生活地区，特别是对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语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用英文撰写了《满洲里地区通古斯鄂温克语》一书，于1991年在赫尔辛基出版。他在这本著作中对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语的

语音系统、词汇特征以及有关形态结构进行了描写、分析。该书由绪论、语音、词法、形态变化、特殊词汇等内容构成，还附有参考文献、缩写词、词汇索引等。他认为，莫日格勒鄂温克语有6个长短元音和17个辅音。据杨虎嫩教授分析，莫日格勒鄂温克语是受布里亚特蒙古语影响较大的一种语言，莫日格勒鄂温克语的许多语音成分同布里亚特蒙古语的语音系统存在相同之处，尽管如此，该语言还是保留着自己原有的语音特征。该书的重心主要放在对莫日格勒鄂温克语的语音结构系统的分析方面。另外，杨虎嫩教授在《分析学会》会刊上发表了《有关东北哈姆尼堪鄂温克的研究材料》的论文，文中从社会结构、方言区别、种族历史等方面对分布在中国的通古斯鄂温克族进行分析讨论。提到分布在中国的通古斯鄂温克语，是“两种哈姆尼堪蒙古语和两种哈姆尼堪鄂温克语在历史上以四种形式的双语关系交织在一起。”^①但同时杨虎嫩教授也承认这种论据也许还不够充分。另外杨虎嫩教授在2002年《满语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鄂温克语言的未来》一文。论文从分析中国和俄罗斯境内鄂温克语的现状入手，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对于俄罗斯和中国部分地区来说，鄂温克语是一种濒危语言，但在中国另一部分地区（鄂温克旗）鄂温克语将继续存在下去，最后作者对如何保护和延续鄂温克语提出了十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此外，日本学者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的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词汇的分析和与语法形态变化，以及与通古斯鄂温克语相关的语言进行的比较研究方面。比如，日本语言学家福田昆之于1988年出版了其撰写的《日本语和通古斯语》一书。书中主要讨论了包括鄂温克语在内的通古斯诸语同日本语的基本词汇间存在的共有现象及语音对应关系和语义关系，同时还论述了有关语法形态结构方面存在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福田昆之提出了日本语和包括鄂温克语在内的满-通古斯诸语属于同一个语系的学术观点。另外，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津曲敏郎教授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风间伸次郎副教授，在1988年至2004年间多次到鄂温克族生活区进行实地语

^① [英] 杨虎嫩：《有关东北哈姆尼堪鄂温克的研究材料》，剧乐平译，《蒙古学信息》1994年第1期。

言调查,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语音资料和话语资料。尤其是 1988 年夏季津曲敏郎和风间伸次郎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的实地语言调查, 1993 年和 1996 年津曲敏郎对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补充调查, 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除此以外,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鄂温克语研究成果也比较重视, 如津曲敏郎教授编辑出版了《朝克著〈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英文索引本》(英文版, 1993), 为西欧学者使用《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带来了很大方便。另外, 日本北海道大学承担的日本文部省的“中国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研究”项目(1988~1994)的科研成果《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基本词汇对照集》(朝克, 1995)以及《中国通古斯诸语基础词汇对照》(朝克, 1997)等, 也先后用日文在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出版。

根据现有的所掌握资料来看, 我国的通古斯鄂温克语调查研究工作, 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方面的搜集、调查、分析、整理等工作开始的比较晚。在 20 世纪初期, 一些民族学家从民族学的角度进行调研时提到过通古斯鄂温克语的特殊性、复杂性, 但没有做过语言方面的具体调查。在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中虽然对于鄂温克族进行过全面调查, 遗憾的是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同样没有作具体的调研, 在 1959 年编写的《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苏木调查报告》中涉及语言的仅有一些简单的亲属称谓, 而且当时没有使用国际音标来标注, 也没有语料的整理, 从鄂温克语现在面临的濒危状况来说是有些遗憾。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我国学者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没有发表过任何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等。由此, 该研究领域, 一直处于空白阶段。

国内学者中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是本民族的学者朝克。1981 年, 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北方语言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朝克首次对通古斯鄂温克语进行了实地调研。而且, 1981~2008 年间他多次到通古斯鄂温克人生活区, 对通古斯鄂温克语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 收集了相当丰厚的第一手语料, 这些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在他的《鄂温克语研究》、《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等科研成果中不同程度地讨论过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在《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日文版, 北海道小樽商科大学, 1997)

一书中除了搜集、整理、发表通古斯鄂温克语一千个基本词汇之外，还提出了该语言的语音结构特征。另外，在他公开发表的《论鄂温克语方言语音结构特征》等论文里将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同索伦鄂温克语语音、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进行比较研究，也探讨过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及其结构特征。与此同时，朝克研究员还同日本北海道大学的黑田新一郎教授与津曲敏郎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风间申次郎教授、日本大阪民族博物馆的佐佐木史郎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吴燕和教授等先后到通古斯鄂温克族生活的区域，对他们的语言开展过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实地调研，但至今未公开发表所调研的相关成果。

总而言之，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至今未能见到。在朝克研究员的相关成果里一定程度地探讨过该语言的语音特征及其一些基础词汇，但对于复杂多变的语法现象没有进行讨论。国外专家学者虽然做过一些调研，也没有公开发表相关成果。所有这些，毫无疑问跟该语言语音系统及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复杂性有必然联系。特别是，该语言成为濒危语言后语音音位的不稳定性，许多语法现象的模糊性使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很难准确把握或整理出其语音系统以及错综复杂的语法形态变化规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通古斯鄂温克语还是一个未被全面研究的语言。由此，更加体现出对于该语言开展实地调研，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书主要使用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及名词形态论和动词形态论的研究方法，对于严重濒危的鄂温克语形态变化语法现象进行了抢救性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如前所述，通古斯鄂温克语已处于严重濒危状态，除了100人左右的人口较熟悉或基本熟悉母语之外，其他的人基本不使用母语，他们转用蒙语或汉语交流。所以，对于该语言进行田野调查时，要使用濒危语言学调查方法。也就是对于该语言进行田野调查时，要对发音合作人或调查对象，做反复多次和不同角度的调研。对于他们实在不懂或不明白或者被遗忘、被淡化、被丢失的语音现象、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做调研时，可以用相关方言土语的语音、语法资料为例，进行提示性、诱导性、启发性的调研。同时，把这些通过提示想起来的音素或语法形态变化要素，放到具体语句中再做进一步调研。在此基础上，给这些语音和

语法成分进行定位分析。

名词形态论就是对于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因为，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有它们约定俗成的共同特点。而且，不同语音结构形式及其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现象，在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后面使用的情况基本相同，几乎没有区别性特征。就拿复数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tsəl/ 与工具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ɕi/ 来讲，均可以同样接缀于名词 bəj “人”、代词 əri “这”、数词 əmun “一”、形容词 əru “坏” 等后面，表示这些名词类词的完全相同的复数及工具格语法概念。比如，bəj-tsəl “人们”、əri-tsəl “这些”、əmun-tsəl “许多的一”、əru-tsəl “许多坏的”，以及 bəj-ɕi “用人”、əri-ɕi “用这”，əmun-ɕi “用一”，əri-ɕi “用坏的” 等。正因为如此，把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等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一并放入名词形态论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顾名思义，名词形态论是指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研究方法论。那么，在名词类词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中主要包括数、格、人称、级四种结构类型的语法形态变化体系。对于名词类词的这些形态变化现象，本书从名词形态论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研究。从而科学地论证了名词类词的（1）数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2）格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3）人称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4）级形态变化现象的结构特征、使用关系、语法意义。

与名词形态论相对应，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语法形态变化系统里，还有以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动词形态论。换言之，动词形态论就是对于动词类词错综复杂、结构严谨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展开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比较而言，动词形态论所涉及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要比名词形态论的理论框架里讨论的内容复杂而烦琐。其中，首先论及的是一般动词，就是基本动词的形态变化系统中含括的态、体、陈述式、祈求式、假定式、命令式等语法现象；其次，还要讨论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现象及其所表现出的不同语法概念。从动词形态论的理论视角去观察，在动词

类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形态变化现象中，作为态和体的语法表现形式的词缀结构系统相对要简单，而动词类词的其他语法现象所表现出的结构系统及其语法意义都相当复杂。特别是，陈述式的形态变化现象显得十分细腻而繁杂。尽管如此，该书内将一般动词、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一并放入动词形态论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和研究。

另外，我们的调研资料表明，在通古斯鄂温克语名词类词及动词类词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里，还有一些分别由阳性元音 a 与阴性元音 ə 为核心构成的两套词缀系统。其中，以阳性元音 a 为主构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般都使用于由阳性短元音 a 长元音 aa 为核心的名词类词与动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以阴性元音 ə 为主构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要使用于由阴性短元音 ə 或中性短元音 i、e、o、u 及其阴性长元音 əə、与中性长元音 ii、ee、oo、uu 为核心的名词类词与动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然而，以中性短元音 i、e、u 为主构成的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能够接缀于由任何元音组成的词根或词干后面。

在这里还需要解释的是，虽然在本书没有涉及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结构分析内容，但在实际调研时充分运用语音形态论的理论方法，对于该语言的语音做了全面调查。并参照朝克研究员早期语音分析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研中获得的第一手语音资料、话语资料。不过，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做了些补充完善的工作。其中，包括 a、ə、i、e、o、u 等 6 个短元音，aa、əə、ii、ee、oo、uu 等 6 个长元音，以及 b、p、m、f、w、d、t、n、l、r、s、ɕ、ʈ、ʃ、j、g、k、h、ŋ/ŋ 等 19 个辅音。而且，在元音系统中根据语音形态论的角度，在通古斯鄂温克语元音系统中，还分析出阳性元音 a、aa，阴性元音 ə、əə，中性元音 i、e、o、u、ii、ee、oo、uu。所有这些，运用语音形态论的研究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对于通古斯鄂温克语的名词形态论及动词形态论的研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撰写过程中，还利用了阿尔泰语言学、语言接触学、方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在田野调查中，充分运用语音调查、词汇调查、语法调查和会话调查的实地调研方法论之外，更多的是利用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方法和理论，对那些母语讲得较好的老人做调查的同时，还对